

青海民族大学学术丛书 之八十三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 政企关系研究

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in China's Western Ethnic Areas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ormal System

陈文烈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青海民族大学校长基金资助项目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 政企关系研究 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in China's Western Ethnic Areas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ormal System

陈文烈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研究/陈文烈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96-2274-2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关系—国家行政机关—研究—西北地区
②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关系—国家行政机关—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F27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9904 号

组稿编辑: 孙 宇

责任编辑: 孙 宇

责任印制: 杨国强

责任校对: 超 凡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2274-2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自序

本书的选题缘于2006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与导师曹阳教授的学术交流，他认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是“关系”和“权力”。这两个概念既是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家面临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更是企业家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问题。所以在他看来，整个真切的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家行为、企业史、社会、政治、市场及其实践可以围绕这两个概念展开并运转。此次虽然短暂但逻辑缜密、立意高远的提醒使得来自青藏高原的我找到了探究和发现上述概念的方向。

平心而论，我不勤奋，甚至有些慵懒，唯一能做到的是慢腾腾地坚持住自己的志业，三年的博士生涯一直在导师所精炼的主题中思考。有时候发现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有时候发现其他重要问题是所有人类文明的问题，未必单是民族地区的问题；有时候反过来质疑，关系与权力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西部民族地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类文明的问题。坚信、质疑、再建构、再质疑……直到一个明晰的内核形成：由于其他社会有凌驾于其上的宗教与制度，所以它们在其他文化中很难大行其道。可见，设立各式各样的制度是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跨越各式各样的制度则比较特殊的是民族地区企业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那么，什么途径或方式最容易跨越制度呢？自然是关系和权力。可以说，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就是一个因受中原文明冲击而重建民族地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之制度的历程，只是因为关系与权力的顽强运作，此历程不但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可能被其融化，甚或可能发生拐弯。

就这样，三年来伴随恩师日渐花白的发际线越发清晰，我的论文也渐渐丰满成熟了，我们尽可能地抛开一大堆专业上的视角、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尽量从摆在我们面前的现象入手，耐守住我们自己的立场。在民族地区，制度与关系是共生的，他们彼此相安无事，各有自己的功能与目标，也没有谁能压住谁的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的是，当他们运行于政治、社会与市场时，不但会发生经济学家所热衷的博弈现象，也可以互相包含、互相抬举、互相关照、互相表彰等，构成了我们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关键以及由此而可能建立理论的精华所在。

我将研究的视角放在了近二十余年市场化改革的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及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以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下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 and 概念,运用经济学方法对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行为、民营企业的成长路径和环境、政企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和“自发”的民营企业在制度变迁与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内在联系、作用机制及演化路径,揭示其本质特征,以增进人们对转型期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发展历程的理解。

本书基于非正式制度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视角,依据非正式制度视角下“政企关系”的内在理论逻辑及该问题在制度分析中达成均衡所涉及的不同层面述评了现有研究成果,并初步梳理出历史、制度及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考虑了历史条件、宗教社会约束和企业行为,分析表明,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具备对非正式制度型构、适应及演化的不断耦合功能。进一步理论分析则表明,非正式制度是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跨越制度障碍的最优选择。同时,对现有文献没有很好地回答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非正式制度诉求的深层根植性缘由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针对非正式制度及变迁对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创新性地引入了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明确了本书研究问题的基本理论逻辑,即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大多数制度变迁都会涉及微观层面的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演变,进而形成非正式制度的“内卷化”路径。通过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主关系网络建构的行动逻辑以及对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关系的具体剖析,本书认为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形塑具有明显的嵌入性与契约的关系性特征性质,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模糊关系产权”,非正式制度诉求在西部民族地区具有制度基础。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则表明,在西部民族地区转型初期,一定的区域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中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尽管面临着较强的政治约束,却是比正式制度配置方式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中民营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

2013年7月

前言

经历了 20 余年市场化改革的西部民族地区较之改革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及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本书在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下以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 and 概念，运用经济学方法对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行为、民营企业的成长路径和环境、政企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和“自发”的民营企业在制度变迁与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内在联系、作用机制及演化路径，揭示其本质特征，以增进人们对转型期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发展历程的理解。

本书基于非正式制度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视角，依据非正式制度视角下“政企关系”的内在理论逻辑及该问题在制度分析中达成均衡所涉及的不同层面述评了现有研究成果，并初步梳理出历史、制度及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考虑了历史条件、宗教社会约束和企业行为，分析表明：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具备对非正式制度型构、适应及演化的不断耦合功能。进一步理论分析则表明，非正式制度是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跨越制度障碍的最优选择。同时，对现有文献没有很好地回答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非正式制度诉求的深层根植性缘由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针对非正式制度及变迁对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创新性地引入了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明确了本书研究问题的基本理论逻辑，即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大多数制度变迁都会涉及微观层面的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演变，进而形成非正式制度的“内卷化”路径。通过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主关系网络建构的行动逻辑，以及对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关系的具体剖析，认为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形塑具有明显的嵌入性与契约的关系性特征性质，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模糊关系产权”，非正式制度诉求在西部民族地区具有制度基础。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则表明，在西部民族地区转型初期，一定的区域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中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企业制度和组织形式，尽管面临着较强的政治约束，却是比正式制度配置方式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中民营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

本书主要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笔者通过刻画当前西部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表征,以及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非正式制度诉求的路径,综述国内外关于非正式制度、政企关系的不同论述,引出了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本书主体部分的内容是第二、三、四、五、六、七章,第八章对本书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并指出研究的不足。

第二章提出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非正式制度诉求的深层根植缘由是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行政干预的存在。本章通过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非正式制度诉求问题中隐含的逻辑线索,认为民族地区对发展的曲解、对历史发展单线论的真理化是政府干预的理论起点;跨越式发展效应是政府干预的经验起点;经济社会发展共时性诉求是政府干预的实践动力。指出政府主流管理思想对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干预具有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梳理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干预多方面的现实表征。在对原因、结果梳理基础上,对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干预逻辑展开等问题进行理论反思,指出政府干预的存在是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非正式制度诉求的深层根植缘由。

第三章通过剖析影响民营企业主行为选择的结构性因素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表明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主基于关系网络建构的行动逻辑具有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工具特点。并提出非正式制度特性的传统机制再造与约束、不平等的竞争与阶级意识的欠缺以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当务之急。当然,无论是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还是新发展观的理论阐述,都不能仅仅驻足于注重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性。

在前两章的基础上,第四章对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关系研究进行了讨论。本章通过一个大样本的实证性研究认为,尽管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退出了民营企业,而且没有直接参与几乎在同一时期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是,政府依然通过“政府企业家”的代理人形式对企业行为产生广泛的影响。在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一模式的作用机制后,笔者还就该机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在转轨经济环境中民营企业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与标准市场下的最优条件相比,这是一种次优选择,但是这种影响日渐式微。

第五章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对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的利用及其演化分析,指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市场化关系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市场化关系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抑制经济的增长,而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化关系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的。

第六章在嵌入性视角的引导下,进入契约的关系性特征理论领域。对契约的关系性特征的分析,以威廉姆森的契约治理结构理论作为基点。在分析了其理论脉络和隐含假设后,本书提出了三个假定,即约前关系导入、多元关系属性、对关系属性的有限控制。在新的假设下,首先讨论了契约治理结构和嵌入关系结构之间不同的对应关系,并特别探讨了两者间的结构性摩擦。继而,在契约的关系性特征的研究中引入了委托—代理关系,于是“二次嵌入”问题被提了出来,这给再缔约过程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最后,以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为例,说明了契约的关系性特征理论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意义。

第七章和第八章提出“模糊关系产权”的概念,这一思路的基本观点是,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是: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和形式是与政府和社会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产权结构和形式并不是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反映了企业的独立性。恰恰相反,产权是一束关系,反映了一个组织与其环境,即其他组织、制度环境,或者组织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关系产权是一个组织应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机制。本章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出发,为解释产权在西部民族地区转型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有关的经济现象提供一个不同的分析角度。为此,笔者需要首先回顾一下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和它所面临的困难,其次,集中讨论本书的主题——模糊关系产权的概念、理论思路、分析角度以及实证意义,最后,应用这一思路来重新解释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的现象。希望有助于回答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如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生大规模变迁的今天,产权对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和政府及社会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它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最后一章,笔者对本书研究得到的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本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相关研究课题在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作了展望。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	1
第二节 选题意义	2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5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8
第五节 本书的创新	19
第二章 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非正式制度诉求的缘由	21
第一节 对社会经济发展内容和动因多元性的曲解	21
第二节 对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形式多样性的简化	24
第三节 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	27
第四节 源于发展的理论缘由	37
第五节 源于政府竞争力塑造的现实缘由	48
第三章 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关系网络建构的行动逻辑	59
第一节 本章研究的视角	60
第二节 西部民族经济型构式微	61
第三节 关系形塑建构的结构性因素	69
第四节 关系网络形塑建构	74
第五节 结束语	79
第四章 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关系	8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81
第二节 研究的问题	82
第三节 数据及其描述性发现	82
第四节 假设、解释不同观点	84

第五节 方法论	88
第六节 结果	93
第七节 结束语	96
第五章 民营企业非正式制度诉求的演化	99
第一节 关系的表象	99
第二节 禀赋关系向规则化关系的演变递进	101
第三节 禀赋关系演变递进的孕育基础	103
第四节 关系演变递进及动力	107
第五节 结束语	108
第六章 政企关系非正式制度嵌入性分析	109
第一节 嵌入性范式与行为逻辑	109
第二节 契约的关系性特征分析	111
第三节 嵌入性关系	113
第四节 代理人关系嵌入	116
第五节 民营企业的契约关系性特征	119
第六节 结束语	121
第七章 西部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与社会组织结构 ——基于人际关系的视阈	123
第一节 交往与人际关系	123
第二节 主流经济学对人际关系的忽视	131
第三节 人际关系与交易成本	135
第四节 人际关系对经济交易的其他影响	141
第五节 人际关系与民营企业组织	144
第六节 人际关系与企业的组建	153
第八章 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非正式制度诉求的实质	159
第一节 发达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基于文化 空间的比较	160
第二节 西部民族地区市场秩序的一些特征	165
第三节 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的实质	175

第九章 结 论	195
第一节 本书取得的研究成果	195
第二节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198
参考文献	201
后 记	217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西部民族地区的民营企业开始迅猛发展，其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把久远的传统文化、历史传统以及西部民族地区的宗教、习俗和政府行为内嵌在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少数民族社会诸多层面已经服从于市场，从而已不再是经济嵌入繁杂的民族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这一格局在社会表层的表现是：宗教文化、习俗惯例、民族文化甚至村规民约、宗教活动等运作在某种程度上都“经济化”或“世俗化”了。这种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市场化和社会组织机构及其事务的商业化所带给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的，正式制度的型构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非正式制度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革，正是这一点使得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独特的制度环境。

基于非正式制度——发展的视角，民族地区政府行为和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的形成及其内在动力，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制度转型过程两种热点经济研究问题。20 世纪 80~90 年代，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加速了政府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在短期内要全面整体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其制度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现实之间的确存在不小的差距，民族地区熟人社会的本质特征还没有孕育向以陌生人社会为特质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基础，越多越细的政府干预不仅没有与西部民族地区浓厚的非正式制度有机地耦合在一起，进而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在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之下人为地制造了诸多刚性的发展阻力，这就为民营企业利用熟人社会各种非正式制度突破这种发展障碍提供了选择。另外，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对正式制度障碍的突破，是在非正式制度化解民营企业在面临正式制度的压力，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不断变形和迁移以适应正式制度的最优解。也就是说，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经济是一个相当稳定，甚至是超稳定的体系，这一体系天然地对促使其发生变革的新因素生长具有内在的抵抗和反抗能力。但是，市场经济的新因素中能找到生长的空间。旧体制的缝隙或边缘基本上是体制影响比较薄弱的地方，也最有利于新因素的生长，在西部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自增强能力不断式微，这种现状影响下的资源禀赋价值体系的市场化模式，自然就在经济生活的运作方式层面与西部民族地区现有的人治化模式有机地耦合在一起，进而催生了游离于这一制度环境边缘的民营企业，这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中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重要制度环境。在制度刚性甚至制度扭曲的条件下，20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的民营企业，到底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体制内的稀缺资源？在地方政府实施全面经济干预条件下根植于乡土社会和文化自觉约束下的民营企业与政府存在何种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什么途径并如何利用经济社会资源的稀缺资源，进而其存在怎样的发展演化路径，尤其是它如何软化、弱化正式制度的刚性约束并使其具有特殊的契约形式，这种基于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关系诉求的实质是什么？这是笔者写作的最初思考。如同 Nee（1998）所说，没有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如何共同塑造制度和影响经济绩效，仅仅关于制度效应的解释令人难以信服。

因此，如何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从非正式制度——发展的视角探求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在制度变迁与民营企业发展中所形成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节 选题意义

一、理论意义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习俗、人际关系的理念以及转轨时期的社会状况、制度的急剧变迁和民营企业成长的经验，使笔者对西部民族地区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的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找到了理论原形和证明依据，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国有企业日渐式微的现实，使研究非正式制度的资源配置功能就具有了强烈的理论意义。

第一，在方法论上，非正式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制度的层面上将微观社会和宏观社会的结构连结起来，即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

一起。

第二,对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非正式制度诉求方面的研究为企业成长提供了不同于制度经济学的新的视角和理论工具。非正式制度在西部民族地区具有资源配置功能。通过对民营企业的非正式制度诉求形成关系资本的解释,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绩效的差异在于企业关系资本的差异。

第三,关于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表现问题,不应局限于其表象形式,其形成、发展演化和功能是立体的、多方位的。传统文化和政府行为都能形塑非正式制度,其发展演化与经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高度相关,其配置资源的功能日渐式微。

第四,资源配置手段至少有四种,即市场、企业内部的层级制度安排、计划 and 市场化关系。本书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极大地弥补和丰富了主流经济学说关于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企业二分法的观点。

第五,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有较大意义。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非正式制度诉求有利于进一步揭示非正式制度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范围。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正处于全面的转型中,这种转型因其发生在与东部发达地区儒家文化完全异质的少数民族宗教文化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西部民族地区而备受瞩目。研究目前发生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政企关系建构过程中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视角下非正式制度所起的作用,对区域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普遍的价值。

二、实践意义

第一,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在正式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甚至制度受阻的条件下,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非正式制度诉求就起到了弥补体制间隙和漏洞,重建信任的作用。

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转型阶段,地方政府基于简单经济发展的逻辑,在确立经济社会发展过程需要政府干预的思想模式影响下,地方政府的正式制度相应地渗透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制度的制定、执行、学习、监督成本与收益的迅速增长,从而原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发生了扭曲,使得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失去了依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自主经营的价值判断和处置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科学管理自由,正是由于正式制度形塑的组织规范成本过高,或者由于正式制度未能演进,并且带来更有效率的发展需求,因此对于正式制度未予以规定,并且能够软化的行为规范层面的诉求,自然成为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配置资源,获得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优选择。依靠企业经营者的内部人力资源关系,以及民营企业通过宗教仪式、宗族、亲缘、同乡、同学以及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社

会关系等,这种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信任机制在民营企业家的营造和形塑建构中,代替了制度性治理,这是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现实的,也是必然的战略性选择,相应的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形塑对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具有了特定的重要内涵。

第二,对西部民族地区民营企业非正式制度诉求从政府干预、经济社会嵌入型特征及交易费用层面的研究有较大意义。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民营企业而言,交易费用的高低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非正式制度作为降低企业交易费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非正式制度在西部民族地区形塑的便利性。使得民营企业家非常重视非正式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企业网络建设,对非正式制度层面的营造被认为是一种投资。这样,一方面在市场交易领域,非正式制度可以降低交易双方在多元文化人群间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减少信息获取成本的复杂性消极倾向;另一方面在企业间,非正式制度有利于建立多元文化人群间经济交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减少交易谈判费用和合约执行成本。另外,在企业内部,非正式制度有利于增强交易双方的凝聚力,克服他们短期行为。

第三,深化对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问题认识。国内研究非正式制度与政企关系的专著不多,从笔者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来看,还没有把非正式制度与西部民族地区政企关系结合起来专门进行考察的系统研究,缺乏从非正式制度整体上来研究政企关系型构的成果。^①

第四,研究政企关系对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信任的政企关系网络,被制度经济学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最主要的价值渠道。因此,正式制度建设和非正式制度建设同时推进,可以使政府在经济体制、法律、产权制度的改革中,建立健全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同时通过非正式制度的健康发展可以为正式制度的健

①“型构”这个词近年来被学术界高频率地使用,它基本是在“形塑和构筑”意义上使用的。《牛津当代英语袖珍词典》对“formation”的解释是:“forming, thing formed, particular arrangement (e.g. of troops); set of rocks or strata with common characteristics.”(F.G.福勒、H.W.福勒:《牛津当代英语袖珍词典》第7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金山词霸将“formation”解释为“形成,构成,编队”,符合英语解释的前三点,英文第四个意思是指具有共同特性的一组岩石或地层。形塑这个词将雕刻、塑造和积极的构建、构筑的意思结合在一起,看来它是强调人类理性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这个词又带有演进、演化的意思。“型构”对于市场经济秩序来讲是适合的,因为秩序本身就是众多个体所呈现的、统计意义上有规则的状态。邓正来在《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2007-04-06, <http://WWW.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7765>)一文中对“型构”一词使用了23次。黄宗智在《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2007-03-07,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5/09/322.html>)一文中将英文“discursive formation”翻译为“话语型构”。

全提供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增加民众对正式制度的信任并维护其权威。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一、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有关政企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的利益集团理论，詹姆斯·麦迪逊是强调企业同美国政治有联系的第一人，也是关于利益集团问题的第一个重要的美国理论家。尽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广泛的干预，然而，理论界并没有对企业影响政府的行为给予过多的研究和关注。政企关系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引起经济、社会和政治理论界对其进行大量关注却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事情。此时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破灭，西方国家又一次对经济进行了广泛的干预。而这一次社会理论界对产业界在政治领域的行为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出现了众多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文献。

（一）非正式制度框架下的企业政治行为研究

有关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的环境分析，首次由 Sethi 于 1982 年在企业政治行动主义研究中总结提炼出了目前的企业环境、过去的企业活动和未来的环境^①等影响企业政治战略的三个概念，认为每个环境都会对企业的政治战略行为产生影响。

1985 年 Ullmann 通过管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企业政治策略的影响，Ullmann 将管制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对管制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赋予四个变量来进行分析，每一个企业都会面对生产的集体性、利润可预期、当前行为明确和决策制定者等方面的约束。因而企业在管制生命周期内面临不同的战略选择行为。

1993 年 Getz 提出了政治活动的目标、政策类型和企业生命周期等影响企业政治策略选择行为的价值衡量。1965 年 Olson 提出“企业的政治反应”观点，他指出积极的个人或利益集团，分别会基于不同的行动策略，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1982 年 Sethi 提出公司政治活动可以分三个阶段分析，即防御的模式、适应的模式和积极活动主义。

^① Sethi, P.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sm.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82, 24 (2): 32-42.

还有大量的研究试图解释企业参与政治活动的决定因素、企业政治活动给企业带来了经济利益、企业政治活动阻碍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政治行为的伦理分析、捐款对政府政策或选举的影响等。

(二) 基于制度的政企关系研究

1. 制度内涵

制度是一个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概念,它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①康芒斯是第一个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对二者的特点和相互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的制度经济学家。^②他指出:“秩序,或者我叫做集体运行的运行规则的那种东西,它本身在制度的历史上是会变化的。我发现这个秩序具体地表现在各种限额的交易中,在一个丰裕的社会里是不需要这样做的。”^③他将制度区分为有组织的制度安排或称“运行中的机构”和无组织的习俗、惯例、伦理道德。

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含义,相当于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正式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规则。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T. W. 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认为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④制度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⑤另一位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符合个人理性行为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⑥还有格鲁奇也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制度是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⑦狭义经济制度的定义被限定在“选择科学”或“效率科学”的范围内,有时可用经济组织代替经济制度。广义经济制度定义则考虑到导致经济制度发生变动的动态力量,因而“经济制度是各个参加者组织发展的复合体”。^⑧

2. 非正式制度内涵及特征

诺思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划分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上层建筑内涵的现代

①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M]. 蔡受百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39.

② 罗能生.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M]. 北京: 中国财政出版社, 2002: 11.

③ 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 (上册) [M]. 于树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13.

④⑤ T. W. 舒尔茨. 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 R. 科斯, A. 阿尔钦, D. 诺思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53, 257.

⑥ 道格拉斯·C. 诺思.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 [M]. 厉以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95-196.

⑦ 阿兰·G. 格鲁奇. 比较经济制度 [M]. 徐节文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5.

⑧ 王志伟.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51-352.